

物资管理资料汇编

《第四辑》

北京经济学院物管系资料室

一九八〇年十月

关于经济管理体制几个问题的探索

刘 明 夫

关于体制改革问题我们已经摸了一年多，感到情况确实很复杂，需要好好地探索，不宜急于成套，避免主观臆断。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我们到四川去探路。回京后，姚依林同志又叫我们到辽宁来继续探路。无论在四川，还是在辽宁，我们都得到了很大启发。今天我的发言既不代表任何组织，也不作为一种正式的建议，而只是作为个人的学习心得，谈点认识，供大家讨论研究。

体制改革怎么搞？在四川，学到的是三句话：实事求是，因势利导，循序渐进。这就是说，不能有任何框子，要在总结我们自己经验的基础上，提一个方向正确的试点要求，一边试验，一边总结，一边继续探索前进的道路；然后，再试验，再总结，再继续探索前进的道路。这样不断地循环往复，以求产生出一套切实可行的改革方案来。

与此同时，要逐步进行可能的改革，顺乎自然地由小改进入中改和大改。要力争不经过一个大的震动，就完成一个大的改革。我们在辽宁还没有学完，直到今天学到的是这样四句话：以身作则，深入群众，发挥优势，更大贡献。辽宁是全国重工业基地。有这样的工业基地，这么多城市，一定会在四个现代化建设中，做出更大的贡献。问题是要研究出一个什么样的体制，才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发挥工业基地与中心城市的经济优势。

最近，小平同志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里讲到了要继续发扬艰苦创业的精神。那么，我们从事经济工作的同志，艰苦创业精神要用在哪里呢？我认为应当首先用在聚精会神、专心致志地，经过实践——认识——再实践这样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摸索出一条多快好省地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中国式道路这个共同的任务上面。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历史职责。

与此相联系的是，我们到底用一套什么样的经济管理体制，才能更好地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特别是企业、中心城市和老工业基地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这样，使得我们的生产关系更好地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上层建筑更好地服务于经济基础；使得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能够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发挥得越来越充分；使得我们中国能够对人类做出较大的贡献。

现在，我分七个问题谈一些初步认识。

第一，要承认我们的社会主义还处在一个幼年时期。这个论断是叶副主席在纪念建国三十周年的文章里代表我们党提出来的。既然我们是处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幼年时期，我们就不能按照马克思、恩格斯所预言的，在生产力发展水平很高的基础上，取得政权以后的那种社会主义经济形式，来安排我们的事情。这点务必严加区别。那么，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到底有一个什么样的发展过程？是不是可以说大体分为初级、中级、高级三个阶段。

适合于高级阶段的组织形式、管理制度、方针政策、领导方法，不见得适合于初级阶段；同样，在初级阶段适用的一套组织形式、管理制度、方针政策、工作方法，也不能运用于中级阶段和高级阶段，是要变的。因此，我们必须注意，生产关系一定要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上层建筑一定要同经济基础发展的要求相适应。体制问题就是要解决生产关系的问题，要解决上层建筑的问题，使得我们的生产关系更好地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使我们的上层建筑，即各种法律规章、各种管理制度、各种政策办法适应经济基础的要求，这是个很艰巨的任务。我们必须依靠广大的实际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共同合作，努力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

第二，我们的全民所有制可能还带有某些集体经济的性质。既然社会主义社会有个发展过程，全民所有制也有个发展的过程。全民所有制在它产生的初期和中期以及将来的高级阶段不会都是一样的。事物发展的过程是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是由部分质变到完全质变的过程。新生的事物，一开始不可能就是很成熟的。因此，全民所有制的初期，难免带有某些集体经济的性质。正如象现在的集体所有制中还不能不有一些家庭副业作补充一样。因此，国家和企业之间就有个统一性和与这个统一性相联系的独立性的辩证关系。企业与企业之间有共同的利益，因为它是全民所有，但也有在这个共同利益基础上的特殊利益。企业的特殊利益要求企业有相对独立性。因此，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里提出了地方和企业的特殊权益与它们的相对独立性问题。我们要让企业实行独立经济核算，不要随便去干预。这样才便于企业把经济权利、经济责任、经济效果和经济利益结合起来。它有了权就能更好地执行它的责任；它有了权，有了责，就会有更好的经济效果。经济效果不同，企业的收益就应该不同，企业内部个人的收益也应该不同。不能总是干好干坏一个样。国家任务完成得好的，集体利益就多一点，集体中的个人利益也应该多一点；反之，国家任务完成得不好的，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就应该少一些。但是，必须在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个人利益相结合的过程中，加强整体观念。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个人利益三者相互结合，才是全民所有制企业发展的内在动力。正确处理这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是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关键，是党的各项经济政策的核心，是运用各项经济杠杆的准则，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内容。这种认识也正在以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形式，在实践中经受检验。

我们在四川、辽宁看到都在搞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即在国家计划指导下，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在国家计划的指导下这几个字，是陈云同志加的，请同志们注意。在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中，四川采取了利润分成的办法，分成所得的一部分是企业发展基金，一部分是福利基金，一部分是个人奖金。按照这样的办法试点，在思想上引起了两个变化。一是企业里面的整体观念加强了。因为要完成国家的任务，集体才能多得，个人才能多得；反过来完成任务不好还要扣。这样一来，用四川同志的话来讲，就是把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捆在一起了。过去干不干反正一个样，整体观念不强；现在形成了一个个人保班组、班组保车间、车间保全厂的新局面。全厂任务没有完成，整体任务没完成，个人想多得也不可能。再就是加强了经济核算的观念。过去讲经济核算，由于没有和经济利益结合起来，往往时冷时热，流于形式。现在跟经济利益结合起来，经济核算才真正加强了。在这个基础上，企业开始发生了两个显著的变化：一是企业正在变成一个真正具有内在动力的经济组织，二是企业正在变成一个内部相互协调的有机整体。有的当了多年厂长的同志讲，过去不管怎么样，不管厂部底下有车间，车间底下有工段，工段底下有班组，一个个组织都存在，但是厂部面

对着的还是个人。为什么呢？因为干不干一个样，厂是散的，各级组织是散的。现在各级组织都动起来了，协作的空气好，民主的空气好，领导干部和工人关系好，学习和进步的气氛也好。总而言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们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正在不断地完善中。一九五七年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就讲过，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有一个继续建立和巩固的过程，还讲到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不完善。由于种种原因，二十年来，我们没有能够使我们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进一步完善起来、巩固起来。现在已经开始抓这个问题了。这是我们国家一件可喜的大事，也是广大企业干部、工人群众的创举。我们一定要很好地关心、支持、爱护、帮助它，切莫泼凉水。

第三，社会主义经济不能跳过商品经济大发展的阶段。这是回答经济联系的性质问题的。企业与企业的经济联系到底是什么样性质的联系呢？现在的认识，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性质的联系。的确，在实践中有许多难题，使得我们不能不考虑斯大林同志所说的生产资料不是商品这样一个论断是否正确。我们认为在社会主义阶段商品经济并不是跟计划经济不相容的。我们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还很不发达，物资是缺乏而不是极大丰富。我们的技术水平还很低，怎么能够不经过货币来管理我们的经济？来进行经济活动？同时，商品经济也不是资本主义社会所独有的。商品经济本身有个历史发展过程，既有小商品的经济，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又有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只有经过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大发展，才能极大地发展社会生产力。过去因为不承认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我们就往往为生产而生产，不注意产品是为了交换，为了满足社会的需要而生产的。也往往重生产轻流通，重生产轻分配。抓生产抓的欢，而把流通工作和分配工作放在很次要的地位，甚至于不抓。其实，在社会化的生产过程中，生产、流通、交换、分配是不可分割，相互渗透，相互依存的。这一点到日本去看了看，感觉就特别突出。它的生产过程，同时也是流通过程。今后，我们一定要注意把生产、流通和分配捆在一起来抓。因为我们不承认社会主义的经济是商品经济，我们就往往忽视价值规律，不会运用它来进行经济核算，也不会运用它来健全我们的计划指导和正确制定我们的各项经济政策，从而使我们不能正确处理各种利益关系，更好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因为我们不承认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以致同商品经济相联系的许多经济手段我们都不会使用。我们不会运用借贷关系、租赁关系、各种信托关系和各种服务事业来极大地节约社会资金、社会物资和社会劳动力。这是很不明智的。难道资产阶级能够运用商品经济在人类历史上大大地发展生产力，无产阶级就没有本领没有胆量运用商品经济在人类历史上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社会生产力吗？我看，我们大家都是不服这口气的。现在的情况，正在发生一些可喜的变化。在辽宁也好，在四川也好，按照社会主义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这样的认识去实践，效果是很好的。生产是为了消费。工商结合更密切了。为了把流通渠道搞好，我们正在恢复和创立各种交换形式与各种交易的中心，包括贸易货栈，农贸市场，生产资料服务中心，工业品交易中心，工业品批发市场等等。这些东西尽管还有某些毛病，但是只要我们在党的领导之下，加紧工作，我们就能够使它不断完善。我们一定要创造出一套办法，使得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个人利益能够日益紧密地结合起来。为了使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能够健康发展，我认为有必要进一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来探讨：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同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的共性和特性究竟在哪里？

首先是企业的相对独立性同全民所有制的统一性之间的辩证关系要不断地深入研究。

统一分配同自由贸易之间的辩证关系要研究。在比例比较协调的情况下，在经济生活比

较正常的情况下，多数物资是用自由交换来解决的，但有少数对国计民生关系重大而又缺少的物资要采取统一分配。什么时候统一分配应该多一点，什么时候统一分配应该少一点，要随着经济情况的变化而改变。我们必须抛弃那种认为商品供不应求就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的错误认识。我在一九五三年就提出过这样一个错误认识。现在看清楚了，它是错误的。不能够说社会主义社会总是存在着商品跟购买力不平衡的现象。从总体来看，商品跟购买力总是要不断平衡的。每年总可以建立起一个相对的平衡，然后又打破这个平衡，再建立一个新的平衡。我们不能老是搞得供不应求，不注意搞好综合平衡，不注意留有余地。只有做到基本平衡，留有余地，这样才能让人有择优购买的可能，才能督促企业生产出物美价廉的东西。

处理好互助合作和适当竞争的辩证关系，这一点尤其重要。我们没有竞争是吃了亏的。落后的东西一定要逐步淘汰，不能加以保护。但是我们绝不能够搞大鱼吃小鱼，搞损人利己的竞争，也不能损害我们的全局利益，发展本位主义。我们讲的适当竞争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共同利益基础上的，不存在你死我活的利害关系。应该规劝有些同志去掉那些不适当的保密做法，相互封锁不好，更不能挖人家墙脚。这些关系如何处理好，又不妨碍正常的竞争，这是一个很难而又必须完满解决的问题，需要我们很好地研究。

计划调节同市场调节相结合，到底怎么结合法，也要继续探索。我提议同志们注意研究各种中心，如生活资料、生产资料服务中心等等，学会如何利用这些中心去摸底，去系统地了解供需情况，并且根据当时的供需情况，预测今后，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一套动态的平衡。我们一定要逐步形成一套用经济手段领导市场的办法。日本朋友曾经建议我们搞出一套对市场敏感的经济管理体制和计划体制来。我个人是完全赞成这个建议的。我们的经济管理体制、计划管理体制对市场太不敏感了。对市场的敏感，也就是对社会需要的敏感。没有这样的敏感，就永远实现不了管理工作的现代化。

第四，实现四个现代化应当以现有的经济中心为主要基础和主要依靠。目前，中心城市的困难很大。重庆同志概括成四句话：第一，上下都收权，中间怎么办？底下收权指扩大企业自主权，上头收权是指中央部门和省的部门也在收企业。第二，权利与业务不结合怎么办？市里的权力确实有限，有好多事情解决不了。第三，欠账很多怎么办？特别是一些老城市、老工业基地欠账很多，沈阳、重庆如此，其它好多城市也是如此。第四，再继续收厂，把我这个市原有的协作关系搞得支离破碎怎么办？沈阳市有个材料，提到部和省要收的企业占它的产值百分之二十一，占利润百分之五十几。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沈阳市的同志，也对目前中心城市领导机关的处境，概括成了四句话。这就是：坐井观天，难以安定；矛盾太多，有翅难展。为什么说他们自己是坐井观天，有翅难展呢？就因为党和国家长期不开城市工作会议，而上面机关又是政出多门，使他们无法知道作为一个整体来讲，究竟每个中心城市有个什么样的发展方向。只见领导多头，而又互相牵制，很不好办。这种状况，迫使我们必须认真探讨：我们对中心城市的地位和作用应该怎么认识？应该怎样来发挥它们的作用？

中心城市，是历史发展特别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它是集中起来进行分工协作比较先进的有机整体，是国家经济命脉之所在。我们应当研究如何发挥这些各有特点的中心城市的经济优势，来多快好省地实现四化，而不应当加以分割。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曾经讲过城市应当领导农村，我们党的工作重点应当转到城市。这个问题好象有重新提出研究的

必要。特别是现在，我们在农村中已经不再搞穷过渡，不再来回折腾了，政策一落实，广大农民的积极性正在起来。是不是可以考虑：我们在继续狠抓以农业为基础的同时，要注意加强城市工作的领导，注意系统地研究城市工作，注意更好地让一些中心城市发挥它应有的作用，让它们为国家做出更多的贡献。我们要注意到中心城市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要随便去分割它，不要过多地去干预它。要让它享有一定的自主权。

中心城市，本来就是社会化大生产、专业化协作的中心，应当逐步加强；并且从此出发，对外辐射，建立起城城之间、城乡之间的广泛协作。在可能的情况下，应该允许、帮助并且支持它们能够协作多远就协作多远。对于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分工协作，应当主要靠各个中心城市来进行，并由上面领导机关加以指导与帮助。对于城市跟农村之间的协作，也应当主要靠城市来进行，逐步有计划地搞一些卫星城市。当然，所谓中心，有大、中、小之分，而且一个地区有一个地区的中心，一个省有一个省的中心，还有全国的中心。

先进地区的中心城市，还有一个义不容辞的历史职责，就是要帮助后进地区的中心城市与农村。

计划指导、政策指导和组织领导，应该以中心城市为重点。应当在那里摸索出一套计划性和灵活性相结合、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组织形式、管理制度、方针政策和工作方法来，便于我们学会领导经济的新方法。在一切组织形式中，银行最值得注意。应当研究如何更好地发挥它作为一个神经中枢、周转轴心和社会经济调节机构的应有作用。在各个中心城市，需要研究如何逐步建立起我们的金融中心，来帮助党和国家指导与调节全盘的经济活动。

学习四个现代化的经验，应该以主要的中心城市为主要课堂。化工部的经验很好。它组织了十四个城市的化工局，既交换产销情报，又搞互通有无；既交流管理经验和节能的办法，又搞某些生产协作。这种领导方法，值得推广。

社会主义的商品流通，应该以中心城市为中心向外辐射，不要中央管一级批发站，省管二级批发站，某些地方管三级批发站。要尽可能三位一体、一身三任，由上面各级机关加以指导。

科学技术、文化知识的交流，应当以中心城市为中心来进行，并且注意发展跨区交流。城乡差别和地区差别的缩小，也应当以一些主要的中心城市为依托来积极进行。

当然，我们不能把城市搞得无限膨胀，而应当着重于提高。辽宁在挖掘企业潜力、搞生产协作、组织服务工作等方面，已经开始前进。我们所接触到的有利润包干、车间核算、设备更新、产品升级、军民两手、国合联营、改革学制、缩短工时、十揽十销、跨区经验交流、跨区联营、卫星环抱、交易中心、三位一体、产销结合、政策领先等等作法和想法。这对我认识中心城市的作用启发很大。

第五，经济政策。上级机关对企业和中心城市，最好都逐步减少行政干预，把重要的力量放在了解情况，掌握政策上面。要按照客观规律办事，政策问题就更加突出起来。农村靠政策，城市也要靠政策；发展农业靠政策，发展工商业也要靠政策。解放初期一直到一九五七年以前，我们都是很注意政策的。现在，农村工作已经注意政策，城市的工商业政策亟待研究解决。四川的工作是做得很好的。但是，也不是没有问题。比如：四川八十四个地方工厂试点企业只分到利润三千多万元，有一个企业就分到一千万元，就是因为这个企业的价格高，利润高，并不是这个企业的贡献有那么大。现在四川已正确处理这些问题。但是，如何

根据贡献的大小来平衡利益关系，这还是需要很好研究的问题。比如税收政策，价格政策，利息政策等，怎样调整才能使之更加合理，都要认真研究解决。同样，把不同企业中的个人收益分配得好，也涉及到很多政策问题。四川有一个工厂，一下搞了相当于五个月工资的奖金。这也需要领导机关好好帮助解决。现在是经委主持试点，这还不够。我主张有关单位大家合作，搞一个小组，共同去指导试点工作，同时注意研究政策。这不仅是对企业的帮助，对我们自己也会是一个提高。在新情况下，如何调整各行各业之间的利益关系，也是一个很大的政策问题，需要各级领导机关去抓，去解决。

第六，在政策问题的研究上，可以考虑先着重抓三个方面。一个是如何更好地发挥基层企业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看看要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个人利益怎样结合得更好，有些什么政策问题需要解决？要把企业与企业之间、企业内部个人之间的利益调整好，有那些政策需要解决？要使城市作为经济中心更好地发挥作用，有些什么政策问题要解决？二是如何自觉地运用价值规律来领导经济工作，促进经济发展。要把税收、价格、利息、工资等政策，结合在一起来研究。三是如何发展分工协作。为什么我们老是大而全，小而全？为什么我们在部门与部门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常常扯皮？到底要用一些什么政策才能推动专业化协作，组织好社会化大生产？

第七，建议实际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一起亲密合作，坚持不懈地探索我们前进的道路及其发展的规律性。在这方面，我想讲一讲一些领导同志的重要讲话。先念同志说过：（一）不要再来回折腾了。过去折腾来折腾去，损失太大，想起来就寒心。折腾来折腾去，在座的同志都感到精力不够了吧！不讲规律，不研究规律，免不了还要折腾，还要寒心。（二）要注意发挥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要正确宣传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们过去是犯过不少错误，吃过不少亏，但是总要记得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三）现在讲物质利益是应该的，因为已经长期不讲物质利益了。但是还要讲一点革命精神，教育青年学习老一辈革命者的优良传统。

薄一波同志在去年组织调查组的时候，讲了一个很重要的意见。他说：三十年了，把搞研究工作的同志和搞实际工作的同志召集在一起开会，组织起来，搞这样大规模的研究调查，还是第一次。他要求我们亲密合作，共同进入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样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他说：今后二十年，象这样的反复循环不知要有多少次，希望大家亲密合作，把工作做好。

陈云同志一贯强调六个字：全面、比较、反复。这就是看问题要全面，不要片面；要比较，陈云同志特别强调利弊得失比较；要反复，要听得进不同的意见。自己昨天认为对的，今天也要考虑，究竟对不对，在实践中反复检验自己的认识。最近他又讲了这个意见之后，在他身边工作的同志提醒他，你在延安时还讲过，不要唯上、不要唯书，要唯实。陈云同志说：这些话还是符合辩证唯物主义的。

胡乔木同志讲过两点意见。他说：研究体制问题不要只坐在屋子里面讨论。只是坐在屋子里讨论，会徒然引起一些无谓的纠纷。应该到下面去，解剖麻雀。他还说：解剖麻雀，既可以解剖它内部各个方面的相互关系，也要解剖它上下左右的相互关系；既要解剖它的内脏，又要分析它的运动，看它是怎么运动的，能飞多高，为什么只能飞那么高？我看可以请同志们考虑对企业作个解剖，对城市作个解剖，看它究竟能飞多高？为什么只能飞这么高。乔木同志的另一个意见是，形成一个新的观点，比较容易，而形成一套办法就比较难。

姚依林同志说：搞研究工作的同志和搞实际工作的同志要一起来研究问题，深入地调查研究，搞出一个方案来。这个方案，应该达到这样的水平，不仅搞理论研究工作的同志，认为应当这样做，而且搞实际工作的同志也认为是可行的。一定要注意有一个起步点。

我再把赵紫阳同志对我讲的一些意见，向同志们汇报一下。我们到四川第二天紫阳同志跟我们谈了这么几点：第一，搞体制改革从何入手，他说：我的看法是从在国家计划指导下扩大企业自主权入手。这是一个根本点。第二，我不主张急急忙忙成立很多公司，搞得不好就象胡耀邦同志讲的换汤不换药，还是一套行政机构。他主张从生产的要求出发来组织各种联合。可以是公司，也可以不是公司。第三，在搞好各种改革试验的基础上不断地总结经验，要力求不经过大的震动来完成一个大改革。后来，在向他汇报时，讲到四川试点面很宽，领导机关要去做工作的时候，紫阳同志讲，销售人员满天飞，开始有积极的意义。因为，把没有打开的销路打开了，没有建立起来的联系建立起来了，应该支持这样去做。但是搞久了，到处碰不行，领导机关要帮助解决。紫阳同志说：在企业试点的时候，领导机关有两条任务，一是帮助，二是影响。他说：你讲多加帮助，多加指导；我说就是帮助，影响。为什么我讲影响？意思就是少搞行政干涉，而多用经济办法，多用一些经济政策去影响。你们讲要打破行政机构，行政层次，行政区划的框框。怎么打破，从何入手？我说就是从逐步减少行政机构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入手。他又说：一些利益关系要调整，四川没有出大乱子，但是有一些问题要注意，就是利润分配不平衡的问题。他指出，不断地调整利益关系，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主要内容。要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把各行各业、各个企业之间的利益关系调整好，是一代人的问题，不是短期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领导机关的任务有两条：一是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不要把人们引到斤斤计较上去；二是要不断调整利益关系。当我汇报到要发挥中心城市作用时，他说，城市很重要。中心城市作用的发挥从哪开始，就是从建立各种服务中心开始。我们现在建立的一些机构，总是只要人家为它服务，它却不为别人服务。今后要搞到不为别人服务而只要别人为它服务的那种机构存在不了就好了。

我还谈谈邓力群同志的意见。我到社会科学院前后，他三次对我谈要把《资本论》第二卷以及毛主席的《论十大关系》再看一看。在我还没到社会科学院以前，我去看过他。我当时身体不好，他问我还能不能看半天书，他说你是否可以看《资本论》第二卷。我认为《资本论》第二卷很重要，马克思主义的再生产理论很重要。我们的经济工作之所以出现这样或那样问题，归根到底就是因为我们不懂马克思主义的再生产理论，更谈不上很好地运用。又有一次，他跟我谈到成立工业、农业、财贸研究所时说到，三个所的共同任务，就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再生产理论。《论十大关系》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再生产理论在中国的发展。

我觉得有条件的同志最好把《资本论》第二卷、毛主席的《论十大关系》好好读一读，在理论上武装一下。同时密切注意新鲜经验。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在党的领导下，经过试点，不断加深我们的认识，搞出一套办法，把体制改革搞好。

从我国物资工作的经验看物资体制的改革

车 国 成

研究物资体制的改革，究竟应当从何着手？也就是说，应当以什么为主要根据？这是应当首先解决的问题。华国锋同志提出：“总结经验，改进物资工作，为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作出贡献。”我认为华国锋同志在这里不仅说明了物资工作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密切关系，而且指出了改进物资工作的正确方法。我们只有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为指导，首先总结我国物资工作的实际经验，以此为出发点，再结合我国的国情借鉴世界上其他经济发达国家的某些好的管理经验，才能使我们对物资体制改革的研究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

建国三十年来，我们的物资工作实践，从正反两个方面为我们提供了比较丰富的经验。其中，主要的有五条：

第一，对同国计民生关系较大的重要物资，要坚持计划分配。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由于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和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物资的生产不是取决于社会对物资的客观合理的需要，生产物资的资本家也无法计算社会对物资的真正需要情况，而是价值规律在那里自发地起支配作用，这种物资生产的盲目性就决定了物资流通的盲目性。与此相反，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由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及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要求，国家对物资的生产可以而且必须按照社会对物资的客观实际需要（除了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需要外，还有储备、出口、援外的需要等）而有计划地进行，这种物资生产的计划性就决定了物资分配的计划性。列宁曾经强调指出：“只有按照一个总的大计划进行建设，并力求合理地使用经济资源，才配称为社会主义的建设。”^①列宁所说的“合理地使用经济资源”，其中就包括对社会主义建设关系重大的物资实行计划分配。这种由国家分配重要物资的制度，不仅在现在物资比较缺少的情况下需要，就是在将来经济比较发达的时候仍然需要，只有在不同的政治经济形势下国家分配物资的数目和品种有所不同。过去，我们实行这种制度，保证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今后，仍然应当坚持下去。

第二，对同国计民生关系较为次要的一般物资，要实行市场调节。随着社会生产不断发展和分工越来越细，物资的数量也越来越庞大，品种越来越多，规格越来越复杂。对这些浩如烟海的物资，不可能全部都列入国家计划。列宁一方面指出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既要有一个总的大计划，另一方面又反对搞那种企图包罗万象的空想计划。他说：“现在对我们来说，完整的、无所不包的、真正的计划 = ‘官僚主义的空想’。不要追求这种空想。”^②哪

里有商品生产和市场，作为商品生产基本规律的价值规律就要起作用，因此，在我国，市场经济和价值规律的存在和发挥作用就是不可避免的自然合理现象。当然，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价值规律所起的作用不象资本主义社会那样是自发的，而可以被人们自觉地利用，市场经济也不象资本主义社会那样处于统治地位，而是计划经济的一种必要的补充形式，过去，由于把价值规律同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对立起来，又把市场经济同资本主义联系起来，把物资管得过死，一律不能在市场流通，加之不少物资又不是以需定产，而是以产定销，致使生产的物资不能适应和满足用户的实际需要，造成物资一方面供不应求，另一方面大量积压。今后，对于国家计划分配以外的一般物资，可由物资部门和生产企业通过市场进行销售，只是价格不能超过国家规定的幅度。欧洲有的国家，在国家计划的指导和控制下，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的作用，经济效果较好，可供借鉴。我们的物资部门，也可采取设立固定交易所、举办现场展销、组织企业流动展销和设立代销门市部等灵活多样的形式，在国家方针政策和计划指导下，通过市场调节，组织进入市场的物资交换，以补充国家计划，促进经济发展。

第三，要在生产部门的积极支持和配合下，由国家物资部门加强对物资的流一管理。在资本主义初期，每个企业的资本家不但要负责安排自己企业的生产，而且要靠自己解决自己企业物资的采购和销售。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到了资本主义的高级阶段，就为适应社会经济的需要而分离出一个专门负责物资交易的物资部门。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由于私有制和生产的无政府状态，那个物资部门不可能对物资实行有计划的合理的统一管理。今天，我们的生产资料是社会主义公有制，我们的经济是计划经济，我们的生产是现代化的大生产，这就使我们具有统一管理物资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这里所说的“统一”并不是把所有物资的管理都集中于中央，而是把通用物资的管理统一于国家的各级物资部门。

在这面，常州市物资局是个好典型。应市由物资部门对物资实行统一供应和管理后，体会到有“五个有利”（有利于市委加强对物资工作的领导和对物资的统筹安排；有利于集中力量打歼灭战，保证重点；有利于调活物资，加速物资周转，压缩社会库存；有利于改革订货制度，克服采购人员满天飞；有利于生产主管部门集中精力抓生产）。上海市取消了工业局和工业公司两级库存，由物资部门统一设库直接把物资供应到生产企业后，很快做到库存下降，生产上去。生产主管部门“三不”（对统一供应意义不理解，对能否保证供应不放心，耽心指挥调度不方便）变为“三欢迎”（主管局欢迎，供应部门欢迎，企业欢迎），物资部门也由“三怕”（怕品种供应不上，怕服务工作跟不上，怕对生产建设保不了）变为“三敢”（敢挑重担，敢于负责，敢于改革）。既然象常州这样的中等城市以至象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都可以实行物资统一供应管理，还有什么地方不能实行呢？

第四，要在保证生产需要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加速物资流通。物资生产连续进行的过程，既是不断生产物资的过程，又是不断消费物资的过程。马克思说：“要使生产过程不致中断，就要在新产品还不能补偿旧产品的整个时期，储备一定量这样的原料、半成品。”^③很明显，要保证生产连续不断地进行，就必须准备必要的库存物资，以源源不断地向生产过程进行供应。这种库存物资的品种、规格和数量，应当始终保持在合理的水平。如果库存不足，不能满足生产需要，生产就要中断；如果库存多余，超过了生产需要，就要造成积压，阻塞物资流通。而物资流通的速度，反过来又影响到生产。对此，马克思又指出：“流通时间和生产时间是互相排斥的。资本在流通时间内不是执行生产资本的职能，因此既不生产商品，

也不生产剩余价值。……流通时间的延长和缩短，对于生产时间的缩短或延长，或者说，对于一定量资本作为生产资本执行职能的规模的缩小或扩大，起了一种消极限制的作用。……流通时间越等于零或近于零，资本的职能就越大，资本的生产效率就越高，它的自行增殖就越大”。④在这里，虽然马克思专门分析资本主义所用的“资本”和“剩余价值”这些概念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但是他指出的加速流通可以促进生产发展的原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仍然是有效的。要最大限度地加速物资流通，需要做很多工作。例如：不受行政区划限制，而按照经济区划加强合理的经济联系；总结体制改革中的利弊得失，确定正确的物资管理体制；根据物资的正常流向，合理设库和建立供应网点；发展适宜直达物资的直达供货，尽可能地减少中转环节和中转次数；核定物资的适当周转定额，认真清查和充分利用库存物资，等等。其中，清仓利库是加速物资流通的重要环节，也是当前我们物资工作的薄弱环节。一些年来，由于主客观多方面的原因，出现一面到处叫喊物资供应紧张，一面又有许多重要物资积压在仓库里的矛盾现象，这实在是捧着金碗讨饭。我们应当分析原因，对症下药，狠抓清仓利库，确定各种物资的合理库存量。所谓“合理库存量”，不是绝对的，而是随着各种条件特别是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不断发挥而变化的。上海市煤炭公司加强调查研究，坚持群众路线，实行社会主义协作，在保证全市生产需要的前提下把煤炭库存量压缩到相当于全市七至十天用量的先进水平，在这方面为物资工作树立了一个先进的榜样。

第五，我们的物资工作，必须为社会主义生产任务。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也是流通（即交换）的泉源。恩格斯指出：“没有交换，生产也能进行；没有生产，交换——正因为它一开始就是产品的交换——便不能发生。”⑤这就是说，生产决定流通，只有保证生产需要，才能保证物资流通的泉源；只有促进生产发展，才能扩大物资流通的泉源。同时，恩格斯又指出：生产和交换“这两种职能在每一瞬间都互相制约，并且互相影响，以致它们可以叫做经济曲线的横座标和纵座标”。⑥这就是说，物资流通反过来又对生产起着不可缺少的重要的积极作用。只有搞好物资流通，才有利于生产发展。因此，我们一向认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既是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也是物资工作的总方针。物资工作归根到底是为生产任务的。是否保证了社会主义生产需要，是否促进了社会主义生产发展，应当作为检验物资工作质量的首要标准。

二

我国物资工作的基本经验，反映了社会主义物资流通的特点，体现了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是我们进行物资体制改革的主要依据。当前，在改革物资管理体制的讨论中，意见分歧和争论的焦点集中在：究竟在国民经济中，需不需要有一个相对独立的物资部门？物资是以统一供应管理为主好，还是以多头的分散供应管理为主好？

主张分散管理的，主要的理由是认为他们的办法是产供销结合，对生产有利，而认为由物资部门统一管理不是产供销结合，对生产不利。这并不符合实际情况。产供销要不要结合？当然要结合。因为物资的生产同供、销本来就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的，所以如果三者各行其是，互相脱节，当然是不对的。但是，产供销结合并不等于产供销合一。恩格斯早就说过：“生产和交换是两种不同的职能。”并且指出：“这两种社会职能的每一种都处于多半是特殊的外界作用的影响之下，所以都有多半是它自己的特殊的规律。”⑦这个论断，既适用于生活资料，又适用于生产资料。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消费之间，有一个负责分配或交

换的商业部门。同样，在生产资料的生产和消费之间，也应有一个负责分配或交换的物资部门。我国物资工作的经验，也充分说明了这点。建国初期，我国的物资就曾实行由各生产部门分散地管理。那种分散管理的办法，如果站在个别生产部门的角度，从局部看，从表面看，从暂时看，似乎对生产有利；但是，如果站在整个社会生产的高度，从全局看，从实质看，从长远看，就不利于社会生产的发展。其不可克服的局限性和弊病，仅就经济方面来说，至少有以下三点：一是只了解局部，不了解全局，加之隔行如隔山，货到地头死，使不少物资在这个部门或其所属企业积压，而在那个部门或其所属企业又急需，无法根据全局的生产发展情况，按照轻重缓急，及时地对社会物资实行合理地统一调度和调剂；二是行行层层都设库，家家户户都充实自己的库存，有备无患，越多越好，把大量超过自己生产实际需要的物资压在仓库里，使整个社会物资库存大大增加，阻塞物资流通；三是多头供应，渠道复杂，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采购人员满天飞，造成国民经济的无政府状态。如果说在社会生产规模较小和物资供应量较少的情况下这种分散管理物资的方法曾经起过一定积极作用的话，那末，随着我国社会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和物资供应量日益增多，它的局限性和弊病就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阻碍生产发展，因此，朝着统一管理的方向进行改革，就是大势所趋，不可避免的了。

在六十年代初期，党中央作出关于成立物资部门的决定，对物资实行统一供应管理，是适应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客观需要所采取的正确措施，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使我国物资管理体制的改革迈出了有重大意义的一步，应当充分肯定。当然，正如一切事物的发展总是螺旋地上升一样，这个改革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破坏和旧的习惯势力的影响，也经历了曲折的过程，至今尚未完成。并且，它和其它任何改革一样，也决不可能一下子就十分完备。由于缺乏经验，那次改革确实也存在着中央集权过多、物资统得过死和单纯依靠行政办法进行管理这三个主要的缺点。这是完全可以通过实践的检验来不断改进的，而不应当由于存在这些缺点就全盘否定改革本身，正如我们给孩子洗澡只能倒掉盆里的脏水而绝不能将盆里的孩子一起倒掉一样。现在，为了适应四化的要求，我们要根据实践提供的新鲜经验，继续进行物资管理体制的改革。

改革后的物资管理体制，要体现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和价值规律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作用，对物资实行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原则，以计划调节为主，同时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在我们的国家，如果没有计划指导和计划调节，我们的物资经济就失去了社会主义的性质和基础，“散、乱、费”的无政府主义现象就会越来越严重，以致重蹈资本主义的覆辙；如果没有市场调节，既不利于物资生产的发展，又不能充分发挥物资的效用，使我们的物资经济陷于僵化。只有计划调节同市场调节相结合，我们的物资管理才能做到统而不死，活而不乱。

改革后的物资管理体制，要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在国家统一计划下，适当扩大地方和企业的物资管理权限，使产供销密切结合，在苏联十月革命后的经济建设中，列宁曾说，在实践中对各种管理制度进行试验是必不可少的，任何有卓见的社会主义者从未设想我们能够根据某些预定的指示一下子就制定出新社会的组织形式。^⑤当前，为了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同时适应财政改“统筹统支”为“划分收支，分级包干”两级管理体制的需要，在企业管理体制、计划管理体制和基建管理体制同时改革的条件下，有的省份已拟出在国家统一计划下改革物资的“统购包销”为按企业的隶属关系“划分资源，分级包

干”的试行方案。为了扩大企业的自主权，四川省在一百个企业的试点过程中，提出了在国家统一计划下，企业有权在国家物资部门、商业部门统购、统配和选购之外，由企业通过各种渠道销售自己的产品和采购自己所需的物资。这些试验，无疑会提供出有益的经验，推动物资管理体制的改革。

改革后的物资管理体制，要有利于人们自觉地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注重运用经济办法进行物资管理。为了鼓励先进，改进生产，促进经济繁荣，在物资的供应方面，对那些产品对路、消耗少、质量好、成本低、利润高的企业要贯彻择优保证的原则；在物资的销售方面，也要允许需用单位按质按价择优订货。一九七九年九月下旬，在四川一九八〇年全省建材三类物资产需衔接会议上试行择优订货，对过去那种搞行政搭配的办法进行了改革，普遍反映良好。同时，为了加强合理的经济联系，还要打破行政区划限制，而按照经济区域组织的供应、调运和交换。

在物资管理体制改革的改革中，要调整和健全物资部门的组织机构。除专用物资和商品部门经营的部分物资外，其余通用物资都由物资部门统一管理。物资部门的工作任务和组织机构，应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负责物资的分配和管理的国家行政机构，这样的机构，要本着精干的原则，简减冗员，合并层次，扫除现存的那种机构重迭臃肿，办事效率很低的现象；二是负责物资的供应、衔接和调剂业务的经济组织，这就要求充实物资部门的金属、机电、化工、建材、木材和燃料等专业公司，设立星罗棋布的物资经营网点，建设一支强大的物资服务队，同时适应发展市场经济的需要，积极恢复和健全物资服务公司，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管供管用管调剂，通过多种形式把物资搞活。物资部门的行政机构和经济组织，都应通过整顿，坚持克服那种“以物揽权，以权谋私”和“惹不起，离不开，信不过，靠不住”的腐朽官僚主义和衙门习气，大力发扬大庆物资部门提出的“宁肯自己千辛万苦，不让前线一时为难”和周恩来同志曾经肯定的组织物资工作人员下厂服务的优良作风。

这样，我们的物资工作就可以更好地坚持计划分配，实行市场调节。加强统一管理，加速物资流通，以保证社会主义生产需要，促进社会主义生产发展，为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作出应有的贡献。

①《列宁全集》第28卷第18页。

②《列宁全集》第1卷第83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160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141—142页。

⑤、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86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86页。

⑧参见《列宁选集》第3卷第570页。

一条产需结合的重要渠道

机械工业开展市场调节的调查报告

刘国础

最近一个时期，我曾有机会参加机电产品的预拨和排产会议，就机电产品实行市场调节的问题，与一些同志进行座谈，并进行了一些实际调查，现就主要情况报告如下：

—

在党的三中全会精神指引下，机械工业的各级管理部门和企业的同志，解放思想，勇于实践，遵循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原则，在保证完成国家重点任务的前提下，对机电产品开展市场调节，广开生产门路，把经济工作搞活，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一九七九年在国家计划任务不足，原材料、燃料供应紧张的情况下，各项任务的完成是历史上最好的一年。二十七大类重点产品、国家重点任务、大型关键产品全部完成计划。工业总产值完成三百六十亿七千万元，比前年增长百分之十一。实现利润六十亿元，比前年增长百分之九点八。产品质量有新的提高，部和省、市、自治区重点考核的产品，品种合格率由百分之八十提高到百分之九十七点四。新产品增加了八百五十六种，比前年增长百分之十二。实践证明，在国家计划指导下，实行市场调节，不但不会影响国家计划的完成，而是把机械工业生产搞活，实行经济改革的重要步骤。具体收获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产需直接见面，扩大了服务面，方便了用户，适应社会各方面的需要

成都军区的同志反映，过去搞一个小水电站，层层申请报告，一件产品一件产品自己到处跑，费九牛二虎之力，起码要三年才能成套使用。去年四季度，他们直接参加了四川省组织的机电产品订货会，一下就订了四十二套小水电设备，今年底以前保证成套供应。本省不产的配套产品，均由机械部门负责代购，并负责调整试车。特别是一些社、队工厂，过去进不了订货会场，购买机电产品更加困难。如四川简阳红塔氮肥厂，是社办企业，过去按渠道申请需要的机电产品东奔西跑，问题得不到解决，现在参加了四川省机电产品订货会，订购了需要的九十八万元产品。重庆仪表总厂还代购本省不产的产品。用户对这种直接交易方式感到十分满意。

产需直接见面后，可以根据用户的具体要求，提供合用的产品。

宁江机床厂生产的纵切自动车床，过去由于产需不见面，不知道用户加工什么零件，只好每台机床配两种通用附件。结果用不上，或只能用上一种，既造成浪费，也不能满足用户

的特殊生产需要。现在，凸轮、附件都按用户需要配齐，把机床调整好再交货，使用户减少许多麻烦，这是过去统购包销不可能做到的。

生产厂不但根据用户需要提供老产品，而且根据用户需要试制提供新产品，开拓新的服务领域。如四川自贡机械一厂，是生产充氧车、充氮车、制氧机的工厂，他们了解到温江地区粮食局，每年为保护粮食要买六十万元杀虫剂，就主动与粮食局联系，试制一种充氧储备的设备。初步协议，先拿出样机进行试验，成功后，定货二十台，每台三万元。辽宁省丹东机床电器厂，是一个三、四百人的小厂，原来生产接触器任务不足。他们通过调查，了解到东北地区冬季汽车发动很困难，要用木材等烧火烤。于是他们就试制一种汽车加热器，只要烧很少的汽油，就可把汽车发动起来，很受运输单位的欢迎。

生产厂不仅为用户提供各种新老产品，为新企业提供成套设备，而且根据各行各业的需要，为老企业挖潜、革新、改造服务。如上海东方造纸机械厂，为山东枣庄造纸厂、浙江松阳造纸厂改造1575园网造纸机，日产量从五吨提高到十吨，全国三百家小纸厂，有这类造纸机三百多台，已有二百多家提出改造的要求。上海新建机器厂帮助嘉兴水泥厂改土立窑为机立窑，水泥产量提高百分之十，质量提高一个标号，煤耗降低百分之十以上。全国小水泥厂三千四百多家，大都是土立窑，如果分批改造好，就可以取得很大的技术经济效益。

（二）开展市场调节，有了竞争，激发了企业内在动力，调动了企业的积极性，促进了生产技术的发展

过去，企业产供销完全靠国家计划和统一分配，好似“水牛掉在井里，有劲使不出”。现在，根据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原则，有了根据市场需要安排生产和销售产品的自主权，企业内部有把精神鼓励与物质利益相结合为动力，外有企业之间竞争的压力，促进企业把生产经营搞活，使企业产生了新的活力，生气勃勃。

扫除了“官工”、“官商”的作风，开始树立市场观念、竞争观念和经营观念，加强了为用户服务的思想，服务态度显著转变。如杭州制氧机厂过去对用户需要有四不接，即：计划外不接，产品目录外不接，零配件或难度大的不接，来料加工不接，用户反映对这个厂“离不开，惹不起，靠不住”。现在，开始转变了，“四不接”变成四都接，并且还增添了许多为用户服务的项目。

质量第一的思想进一步增强，努力改进和提高产品质量。在市场调节中，用户择优选购机电产品，许多企业开始懂得，只有生产优质产品，才能生存和发展。山东枣庄阀门厂，原来产品质量很不好，用户订了货的纷纷退货，他们下决心整顿质量，后来在省召开的订货会上展出了十五种产品，用户选购了三百六十吨。西安汽车配件厂的活塞销，过去质量不好，下命令要他改进，解决不了问题。后来，武汉部队有关单位根据择优选购的原则，通报所属单位说该厂的活塞销质量不好，不能采用，这才引起工厂的重视，下决心改进了质量。

大力发展适销对路产品。过去生产出的产品，国家统购包销，许多工厂满足于生产老产品，十几年、几十年如一日。现在，用户有选择权，要货比货，工厂开始懂得以品种求发展。如昆明风动机械厂，主要生产大型矿用凿岩台车，计划调整后，任务严重不足。他们进行市场调查，根据用户需要，搞变型产品，设计试制了万能凿岩台车，不仅适合井下使用，也适合露天任意方向凿岩；发展了双机采矿台车，不仅适合黑色金属矿使用，也适合有色金属矿开采；还搞成了露天台车，不仅适合矿山凿岩，也适合建筑公路采石。用途由一种变为多种后，用户满意，销路打开，不少单位订货。

加强了成套观念，为用户成套服务。以大制氧机为例，由近百种机电产品组成，缺一件不能成套。过去，由用户自己组织成套，安装投产。现在，工厂根据用户要求，成套设计、成套制造供应，指导安装调试，直至出氧。不仅大型设备这样，小型机组成套也是这样做。如简阳空分设备厂提供给四机部第十设计院的五十立方米/小时高纯度制氮机，把输送氮气的大、小管道也包括在成套范围内，做到把纯氮直送到电子企业的工作现场，以保证纯度不降低，这是过去不可想象的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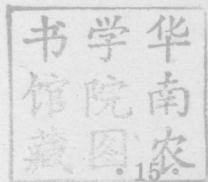
促进了企业改善经营管理，加强经济核算，降低产品成本。机械产品作为商品进入市场，用户自由选购，价值规律起着重要的作用。低价优质的产品受到欢迎，质次价高就卖不出去。这就促使各企业必须努力降低产品成本。如上海机床厂生产的M7120A平面磨床，每台成本六千六百元，售价七千五百元，过去工厂认为售价低，不愿多生产，写报告要求提价。现在，他们发动群众，对该产品逐个零件、逐道工序进行分析，改进那些不合理的工艺，零件结构和材质，在保证产品质量的前提下，使每台产品成本降低了一百二十五元。陕西鼓风机厂，承接了一批纺织轴流风机，如按原设计、工艺生产，要赔本。他们加强了经济核算，从降低铸件成本，提高工装水平，改进材质三个方面着手，做到了略有盈余。

（三）市场调节开始走出一条路子

去年上半年，我们根据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原则，为了改变多年来生产资料的生产和分配统得过死，产职不能直接见面，需要单位找不到货源，生产单位又找不到销路的状况，开始对宁江机床厂滞销的精密仪表机床，提出了保证国家重点需要的原则下，实行产需直接见面订货的试点，登了报，进行了宣传，这样一做，受到了产需双方的热烈欢迎。七月份开始，又对滞销的缸径125系列冷冻机实行了产需见面、直接订货的办法，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在去年七月份全国工交会议和机电产品订货会议后，由于各部门退货较多，一部分计划内的产品分配不出去，物资部门又不收购，还要完成国家增产节约计划，这样，很多企业感到，过去那种单纯依靠上级给任务进行生产，单纯依靠物资部门统购包销的办法已经不行了，再等下去，对产需双方，对国家建设事业都不利。于是他们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鼓舞推动下，积极行动起来。推销产品，承接订货，加强服务，广开生产门路，开展市场调节。在实践中，摸索和创造了许多好方法、好形式，如：举办灵活多样的订货会、展销会；登广告，发函件，实行通讯订货；把用户请进来征求对产品的意见，同时承接订货；走出去访问用户，进行技术服务，提供产品和配件；开设门市部或委托商业部门代销，等等。随着市场调节的开展，经营销售的方式也在不断地发展。如从开始一般的登广告、开展展销会，发展到搞地区之间、工厂之间的联营，建立贸易中心，常年接受订货；从派人出去作一般访问，进行技术服务，到开始着手建立销售服务队伍、机构，建立比较固定的销售服务网点；从只推销单台单件的老产品，到开始注意提供新产品，成套设计、成套供应，开拓新的市场等等，规模越来越大，效果也将越来越好。如上海市机电一局，先是开全局性的订货会，三天签订合同三千二百多份，成交额一亿二千三百多万元；后来，局属八个公司分别进行展销订货，成交额达二亿元左右。最近，他们干脆搬到上海工业展览馆去长期展销，使经营销售服务工作经常化。

二

机电产品实行市场调节以来，初步摸索到一些经验，有不少体会。



(一) 市场调节是计划调节的重要补充, 是计划经济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社会主义企业的生产是有计划的生产。但是, 过去企业的生产计划, 主要是由上级制订下达的, 很不完善。因为通过单一的分配渠道和指令性计划, 并不能把全国千家万户的需要, 两万多种、几十万型号规格的机电产品都包括进去, 并在一年两次订货会上把产需衔接好。就是在物资统购统配体制下, 机电产品也有一部分市场调节, 不过这种调节过去被看成是不合法的活动。机电产品实行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以后, 企业生产计划来源于两个方面, 一是自上而下的任务; 二是企业掌握的社会需要, 自下而上地充实了国家计划。这两方面结合起来, 相辅相成, 互为补充, 使计划更完善, 更好地满足了社会各方面的需要。所以, 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从本质上讲没有什么不同, 只是提出需要的渠道不同。因为, 各行各业发展生产所需要的机电产品, 我们都应该安排生产, 满足需要。

那么, 这样做是不是就不能保证重点呢? 大家认为是可以保证国家重点的, 这在安排生产计划的时候, 要按需要分析重点与一般, 对交货进度有严格的规定, 要排队。当前, 我们就明确规定, 大中型成套项目需要的机电设备, 重点挖、革、改项目及专项任务需要的机电设备, 军工、出口、援外的机电产品, 引进项目留国内制造供应的机电设备, 单机配套中固定协作关系的任务等, 为国家重点任务。这是计划调节的主要内容。在计划安排、物资保证、生产调度、交货发运方面都要优先安排。所以, 我们区分重点的原则, 是看需要的重要性, 而不是看由那一个部门提出来的。

机电产品市场调节以来, 是不是保证了计划调节为主, 有没有搞过头呢? 没有。去年一机工业完成工业总产值三百六十亿七千万元, 其中通过市场调节的产值四十六亿元, 占实际完成的百分之十二点七, 今年的已有任务中, 自销任务所占比重也不到百分之二十。从这个比重, 我们一方面可以看到, 市场调节是计划调节必不可少的补充, 同时, 也可以清楚地看到, 这仅仅是补充, 计划调节占绝对主导地位。大家认为, 如果可能, 把市场调节这部分比重再搞大一些, 会更有利于发展生产, 满足需要。

(二) 必须冲破旧思想、旧习惯势力的束缚。总的来看, 我们绝大多数生产企业的同志, 对市场调节是积极热情的, 但是也有些同志思想还跟不上形势, 还是习惯于国家叫我做什么, 我就做什么, 我生产什么就交给你去销售。有的甚至还很不理解, 说什么干了三十年工厂, 没听说要工厂自己去找活的。这些同志至今放不下架子, 跳不出圈子, 积极性不高。事实证明, 思想解放、主观努力, 是决定性的关键。哪个企业的领导对市场调节的重要意义有比较明确的认识, 积极性高, 行动快, 那个企业就增添新的活力, 跑在前面; 反之, 则落在后面。我们要提高这些同志的认识, 使他们懂得这场改革的重大意义, 投入到改革中来。

另有些同志, 不了解机电产品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成套性强, 一讲到体制的改革和市场调节, 就把机电产品划分几类, 这样做, 就把本来是有机联系的产品, 分成几个渠道供应, 不利于成套组织生产供应, 对使用单位极为不利。过去, 就有不少单位吃过这方面的苦头, 即使建设一个小项目, 也要花好几年的时间才能成套投产, 这对国家有什么好处呢? 国家重点的需要, 一般应通过计划分配渠道供应, 在保证国家重点需要的原则下, 生产部门和企业, 均应主动地、积极开展经营自销活动, 这样既有利于市场调节, 更有利于产需结合。

还有的同志总想用一条渠道, 而不习惯于用多种渠道满足社会的需要。一涉及到物资的交换流通, 就只能由一个部门或单位来管, 别的部门就不能干。这样市场调节也是搞不好的。事实已经证明, 一个渠道是不行的。现在看来, 通过生产部门、物资部门、商业部门等